·文学研究·

包贵思与燕京大学现代作家群

刘丽霞

(济南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2)

[摘 要]包贵思是燕京大学英文系的一位美籍女教授,与燕京大学的现代作家群有较为密切的往来。在包贵思的学生中,既有冰心式的基督徒,也有杨刚式的共产党人,以及萧乾式的反教会者。包贵思的教学经历以及创作经验,典型地体现了燕京大学作为教会大学独特的文化传播功能。

[关键词]包贵思;燕京大学;作家群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16)04-0059-06

包贵思(Grace M. Boynton)是燕京大学英文系的一位美籍女教授。她出生于新英格兰一个公理会牧师的家庭里,从小对中国感到兴趣,十一岁就立志要来中国。她毕业于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研究院,并获得硕士学位。1919年如愿来到中国,任教于协和女子大学、燕京大学,讲授英国文学课程,也秉承父母意旨在中国传教。包贵思是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挚友,也是燕京大学的元老。据包贵思的学生回忆,包贵思的课程很受学生欢迎,她的为人也颇受燕大师生的肯定。包贵思与燕大学生的来往,特别是她与现代作家的来往,在不同时期都有。"五四"前后以冰心为代表,二三十年代则以杨刚和萧乾为代表。包贵思的教学经历以及创作经验,典型地体现了燕京大学作为教会大学独特的文化传播功能。

一、教会大学的文化传播功能

19世纪中后期,教会在华创办的学校多以初等教育为主,后来逐步开办了一些中等学堂。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传教士们发现,仅仅依靠普通教育,是不可能培养出他们满意的人才的。为此,在中国创办教会大学的呼声不断高涨。在1890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举行的第二次大会上,狄考文详细阐述了创办教会大学的必要性:"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是一枝燃着的烛,别的人就要跟着他的光走。这对中国来说,比其他异教的国家更真实。作为儒学思想的支柱,是受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阶级。如果我们要取儒学的地位而代之,我们就要准备好自己的人们,用基督教的科学来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士大夫,因为能取得旧士大夫阶级所占的统治地位。"①

在这次基督教传教士全国会议上,与会代表决定,将1877年由在华各教派联合组成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改组为中华教育会,从单纯编辑出版教科书扩展为对整个在华基督教教育进行指导。此后,教会学校逐步将眼光移向高等教育。20世纪前20年,教会大学得到了迅猛发展。在华传教士专门成立了中国基督教教会大学协会。据该协会1919年统计,已完全具备本科设置的基督教教

[基金项目]本文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国教会大学文学活动考察"(项目编号:13YJAZH054)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刘丽霞,文学博士,济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①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会大学即达13所。早期开办的教会大学,都无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随着对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适应,最初以传教为主的教会大学,逐渐转变为以传授文化科学知识为主。教会大学引进的新观念及开设的新学科,也对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现代化作出了贡献。

在13所基督教教会大学中,包贵思所任教的燕京大学颇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燕京大学是一所由外国教会在中国办的私立学校,并且不是完全由一国教会而是由几国教会参加办的私立学校。其中美国教会自然占最大的部分,而且作为一个大学或法人,它还是在美国纽约州立案注册的。"①支持燕大的美国教会包括南北长老会、卫理公会、公理会等。除教会以外,美国的一些文化教育机构也是燕大的支持者,并成为燕大的重要经济来源,如哈佛燕京学社等。

"燕京是教会所办的大学,免不了要在许多地方表现西洋文化的精神及影响,特别是基督教的精神。而最足以表现这种精神的,则为燕京的校训,即'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次于校训但和它相辅相成的,则为'中西一治'的思想"②。"中西一治"的思想即贯通融汇中西文化的思想。校长司徒雷登曾多次在演讲中强调这一思想,认为这是燕大所能发挥的一种重要作用。

燕京大学是较早实行教学与宗教分离、提倡信仰自由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实行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我们也可以借助一些燕京大学的史料看出。如1928年"11月16日,学生信仰统计表:(一)基督教342人,(二)孔教16人,(三)佛教2人,(四)回教1人,不信仰宗教149人,无表示190人。"③

另外,作为私立学校,燕大无须像一般国立学校那样听命于当时政权,其财政上的独立也使它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办学的自由,而少受政府的干涉。所以,当时国内外的思潮如基督教的教义和哲学、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以及革命思想等,都可以在校内比较自由地传播和发展。

包贵思的教学经历以及创作经验,都很典型地体现了燕京大学作为教会大学的文化传播功能。在包贵思的学生中,既有像冰心这样的基督徒,也有像杨刚这样的共产党人,还有像萧乾这样的反教会者。

二、包贵思与冰心

包贵思与燕大学生的交往,特别是她与燕大现代作家的交往,在不同时期都有。"五四"前后以冰心为代表,二三十年代则以杨刚和萧乾为代表。

(一)密切的师生关系

在杜荣所撰写的有关包贵思的介绍资料中提到:冰心是包贵思初来燕京教书时班上最得意的弟子,她在跟学生们聊天时也常常谈到冰心④。"冰心在她执教的多门英国文学方面的课程中,学习成绩都属优秀,因而受到这位异国教师的喜爱,经常与之来往。在交往中冰心除了请教学业方面的问题外,宗教思想自然也受到熏陶。……经过她敬爱的教师包贵思的启导、牵引正式加入了基督教。后来冰心的出国留学也与这位美国教师有着密切的关系。"⑤1923年冰心大学毕业前夕,包贵思向冰心透露了一个讯息: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已同燕京大学女校结为姐妹学校,每年资助燕大女校毕业生去该校读硕士学位。包贵思就是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派到燕大任教的,特地推荐冰心毕

①参考吴其玉:《北京燕京大学的回忆(1923-1942)》,《燕大文史资料》(第二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②吴其玉:《北京燕京大学的回忆(1923-1942)》,第7页。

③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编:《燕京大学史稿》,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9页。

④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大学人物志》(第一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

⑤万平近、汪文顶:《冰心评传》,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60-61页。

业后即去美国。冰心在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就读期间,还得到包贵思父母的热情招待。1926 年冰心回国,在燕大任教。可见,包贵思作为冰心的恩师,不但在信仰上引导她,而且把冰心引进了英国文学世界,并帮她打开到美国的深造之路。在二人之间,保持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包贵思对冰心的影响不容忽视。

(二)包贵思英译冰心《春水》

1929 年,包贵思将冰心的《春水》翻译成英文,并写了一篇英文"前言",介绍了有关冰心的生平及创作,特别是关于冰心"零碎的思想"这一特殊文体。笔者在搜集资料中找到了这一有关冰心研究的重要文本。

"前言"主要内容如下:

这本诗作是一位女孩首次袒露心声的作品。……在同时代的学生中,她已很有名气。诗歌发表之后,又创作了一些沉思性的散文,接着是一批带有讽刺意味但极富魅力的记叙文,这些作品先后收录于流行期刊和文学选集中。众人对她作品的需求超出她的预想。这对于一位向来喜欢低调清净的作家来说,她的闻名于世令她困扰。她钟情于隐居的生活,从未敢于成为公众的焦点。但她仍继续创作,《春水》于 1923 年一经发表便广为传颂,每年销量平稳无减。

透过这些被称为"零碎的思想"的片段,人们可以读出关于一个中国女孩的早期经历。诗篇的主题浑然天成,超脱尘世的俗套。……她最热爱两样事物,一样是母亲,一样是大海,这两样事物构成她理想中的幸福生活。这也说明她仍是一个未受世俗影响的纯真的孩子……

这一百八十二首诗中最大的一组——共五十四首编排成一本小诗集,描写的多是关于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像醒着的、睡去的、看见的、听到的和嗅到的——感官的印象。诗的内容虽不多,但句句洋溢着清新的魅力,触动了作者敏感的躯体和灵魂。……

我们这位年轻的作家,永远持有浪漫的想法,这种浪漫是全世界青年与生俱来的,这种态度也是因为在其成长过程中的隐居环境里找到了适宜的土壤而滋生出来的。她书写的孤独和郁闷并不是源于外在的境遇,而是内心性情的写照。她纵情于眼泪之中,但绝不会变成病态的人。也许比起沮丧,她心中更怀有一丝欢愉。……

对于家庭生活的回应、一系列敏锐的意识情感、委婉的接近爱的主题的方式以及关于生死乐痛和经验技能构成了冰心写作的素材,她说这些方面正是她必须要表达的。创作题材多是围绕敏感的人们来写的,而非关于娇宠的女子或神秘莫测的东方人,也非其它习俗中的特别之处。风格上的单纯朴素和正直率真引人关注,然而对于关注女性和东方人的大众理念却否认这两种风格。

这些小诗已经受住多年的考验,中国大众也已领悟到其价值所在。这些年来,在美国和中国的西方人都熟知冰心。有人认为:如果说从这位年轻诗人的英译版本的"零碎思想"中得到的快乐有一定减损,那么他们也可能获得类似的价值。……

作为英美文学的教授,包贵思对冰心作品的英译直到今天仍具权威意义。这一点从目前纳入"新课标双语文库"(译林出版社)、仍在出版发行的由包贵思及凯利所译的《繁星·春水》便可见出。作为冰心的恩师,包贵思对冰心的了解是透彻的,因此也为冰心作品的西传做出了独特贡献。

三、包贵思与杨刚

(一)特殊而珍贵的师生情谊

包贵思在燕京大学有两位得意弟子,一位是女作家冰心,一位是女革命家杨刚。如果说包贵思和冰心的师生之谊是一段佳话,那么包贵思和杨刚的师生之谊则长时间令人有些费解。

胡寒生在《追忆杨刚》一文中介绍道:杨刚(1905 – 1957)首先是一个勇往直前、忠诚浩烈的女

革命家。同时,她又是一个出色的记者、作家。杨刚在三十年代开始发表诗歌、小说、散文。她精通英语,协助埃德加·斯诺编译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介绍鲁迅、茅盾、巴金等作品到国外去。她为报纸写国内外通讯、报告文学、社论,主编文艺副刊。在四十年代的新闻战线、文艺战线上留下了显著的成绩,成为知名专栏作家。全国解放后,她先后在外交部、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对外事务和宣传工作,曾任周恩来主任秘书、《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57 年,她因外事活动遭遇车祸,造成脑震荡后遗症不幸病逝①。

自称受杨刚影响很大的著名作家萧乾提到,多年来他曾不解,为什么共产党员杨刚会同笃信宗教的包贵思那么亲近?他曾问过杨刚,但杨刚仿佛不愿多谈这个话题。后来杨刚去世后,杨刚的女儿郑光迪告诉他,自己小时候寄养在包贵思家里。这说明杨刚同包贵思的关系要比一般师生更亲密,但仍难以解释两个志不同道不合的人如何建立并保持友谊。直到萧乾 1979 年赴美访问遇到魏斯特教授,才在他的帮助下找到一些珍贵资料,揭开了包贵思和杨刚的友谊之谜。这些资料包括杨刚致包贵思的几封书信、杨刚用英文写的部分自传,以及包贵思生前所著的一部长篇小说《河畔淳颐园》(*The River Garden of Pure Repose*),其中有些地方写到了杨刚。对照杨刚用英文写的自传,小说中的叙述相当接近她本人的经历②。

(二)长篇小说《河畔淳颐园》:信仰与革命之间的对话

在 20 世纪来华的美国传教士中,女传教士是一个很大的数目。而据《中华归主》1919 年统计,单身女教士占到整个美国传教团的三分之一,其中许多人从事教学工作,因为教育是最行之有效的一种传教手段,任教于燕京大学的包贵思就是其中的一位。据其当年学生介绍:"包贵思老师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燕京的工友和她家的佣人都称呼她'包教士',可是她从来没有向我直接宣传过基督教义,她是在用一种平常的爱心来关心别人,影响别人,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基督博爱精神吧。"③

包贵思创作的长篇小说《河畔淳颐园》有助于我们认识一个传教士教师与其共产党人学生之间的特殊情感。故事叙述一个叫简·布里斯苔德的美国女传教士在战时的四川某城病笃,由一个叫威尔弗里达·格里森的英国女护士照顾。这一天,简的一个叫王维洲的学生来探视。王是四川的一个世家子弟,如今是个军医。当他知道简需要一个幽静的地方疗养时,就慨然邀请这两位外国妇女到他家的一座别墅去住。全书主要描述的就是这座古老园林的沿革和布置,她们每日起居的细节,以及前来探视的一些客人。写到这位女传教士溘然长逝,书就结束了。

书中出现的一个女共产党员柳,是简在北方一家大学教书时的学生。一天,被戴笠追捕的随时都可能分娩的柳经王维洲介绍,搭车来到别墅,向简寻求庇护。她抵达的第二天就分娩了,是个女孩,起名"希望"。正当柳分娩时,国民党警察来查户口。形势紧张,柳无法久留,简让担任美军卡车司机的表弟斯蒂芬把她护送到宝鸡。临走时,柳将孩子托付给简。柳的部分情节与杨刚吻合,部分情节也许是包贵思综合其他学生的经历虚构的。

小说中引人注目的是师生之间展开的一场关于革命和信仰的交谈,从中我们不但看到了基督教信仰与共产革命之间的分歧,也看到了基于理解和尊重的部分认同。如小说中简对斯蒂芬所说:"只要中国人民在受难,柳就不会安歇,更不会享清福。""我是个宣传家,柳也是个宣传家。她为了宣传必须付出重大牺牲,而我不必为我所宣传的牺牲什么。我同她一样希望中国人民可以过得更好。我十分敬重她的勇敢和忠诚。"而柳则曾对简说:"你是我的老师,也永远是我的朋友。现在,我尽量像个孩子对母亲那样对待你。"

---

①参考胡寒生:《追忆杨刚》,《燕大文史资料》(第二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21 – 125 页。

②参考萧乾:《杨刚和包贵思——一场奇特的中美友谊》,《燕大文史资料》(第二辑),第 126 – 138 页。

③参考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大学人物志》(第一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45 – 147 页。

透过小说及小说背后的历史,在包贵思和杨刚身上,我们看到了同样高贵的品质,那就是对苦难民众的深切同情、对自己所认定事业的牺牲精神和不畏考验的勇气,以及对异见的宽容和理解……正是这些共同的品质,使得两位志不同道不合的女性成为亲密的朋友。这样的友谊的确是弥足珍贵的,尤其是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里。这也使得包贵思的小说具有了一种特殊的认识价值。

四、包贵思与萧乾

(一)旁听生萧乾

据萧乾自己回忆:"1929 年考入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班,……当时我还旁听了英文系包贵思教授的'英国小说'。她也是一位富于启发性的教授。……在燕京,我结识了后来对我影响很大的杨刚——当时名杨缤。她是英文系的学生。我虽然是国文专修班的,却也参加了每周五在美国教授包贵思家里举行的读书会。我们就是在那个聚会上相遇的。我们朗读过许多英国(特别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名诗。"①

萧乾后来与文洁若成功合译名著《尤利西斯》。据文洁若介绍,萧乾得以了解《尤利西斯》,部分原因是旁听了包贵思的现代英国小说课程:"1929 年秋,萧乾入了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班。金石学、音韵学、古代批评史等课程,都需要国文根底,而他几乎没有,所以觉得这个专业班不合他的口味。这一年,他倒是被清华大学来的客座教授杨振声讲的现代文学所吸引。上半年讲本国文学,下半年讲外国文学。他有一次从杨先生那里听到英国文学界出了个叛逆者詹姆斯·乔伊斯。这期间他又去旁听了美国教授包贵思的现代英国小说课,她娓娓动听地讲起乔伊斯和他那部意识流开山之作《尤利西斯》。当时萧乾还不知道乔伊斯是爱尔兰人。"②在萧乾为《尤利西斯》中译本写的序中,他也提及继杨振声介绍之后,在包贵思开的"英国小说"课上,又听到乔伊斯的名字。

(二)萧乾对基督教的复杂心态

由于萧乾早年在教会学校中阴郁悲惨的童年生活经历,和 1920 年风起云涌的反帝爱国风潮,萧乾的小说有诸多对教会阴暗面的揭示,因而被美国汉学家路易斯·罗宾逊称为"一位反基督教的作家"。但萧乾明确地说:"小说是生活的反映。我揭露并反对的是二十年代的强迫性信仰,以及宗教和帝国主义的关系,但不反对宗教本身。我尊敬耶稣这位被压迫民族的领袖,也珍视《圣经》以及基督的一生在西方文化史、艺术史上的重要性。我拥护信仰自由,因而没有理由去反对基督教或任何宗教。"

尽管萧乾称自己"并不反对宗教本身",但通过他在 20 世纪 30 年代所写的几篇关涉基督教的小说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他对教会阴暗面的描写,也可以看出他对基督教义的质疑和否定。这几篇小说有的是基于民族主义认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如《皈依》、《昙》;有的是揭露讽刺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吃教"者们的丑恶嘴脸,如《鹏程》、《昙》和《参商》;还有的批判基督教的不近情理,如《参商》。其中涉及到对基督教教义较为深层的质疑和否定的,是其小说《蚕》。

这篇小说的主旨正如萧乾在《一本褪色的像册》回忆长文中所言:"我在第一篇小说《蚕》中,通过一个恋爱故事写了我的宗教观点";"宗教的前提是宇宙间有一位福祸的主宰者。在《蚕》里,我想说的是,即便有这么一位主宰,他也束手无策。福祸主宰在人与自然手里;人凭智力,向自然那里夺福。"③在另一篇文章中,萧乾也提到:"《蚕》是我的一点点宗教哲学。很小的时候我便为有神无神而烦扰着。因为不懂科学,幼时又受了不少三教九流的濡染,充其量我只敢循着'敬鬼神而远

①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大学人物志》(第一辑),第 352 页。

②文洁若:《萧乾的〈尤利西斯〉情结》,《文汇读书周报》2002 年 3 月 22 日。

③萧乾:《一本褪色的像册》,《萧乾短篇小说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版,第 31、38 页。

之'的逃避主义,而结论说,即使有个神,它也必是变幻无常,同时,忘了人类遭际徒然爱莫能助的。蚕的生存不在神的恩泽,而在自身的斗争。这是用达尔文的《天演论》否定了命运。当蚕闹起饥荒时,神也只能顿顿脚而已。他还有他的限度,正如诸星球各有其轨道一样。"①

小说中通过蚕与人的关系,推及到人与上帝的关系,并讽刺了宇宙主宰者的无能为力以及宗教信仰者对自我命运主宰力的放弃。在萧乾看来,那些基督教信仰者的问题除了不明白上帝对于变幻无常的人类遭际爱莫能助之外,也与他们不懂科学、不明白进化论、不清楚一切要靠自己的斗争有关。这显示了萧乾对基督教教义的根本性不认同。

另外,萧乾心目中的宗教不过只是一种精神寄托。老年的萧乾曾反思道:"倘若二十年代我接触的不是原教旨主义的基督教徒,而传教也不用强迫的形式,说不定我还会信教。因为那时作为一个孤儿,我很需要精神上的寄托。"②虽然萧乾试图说明的是他对基督教并无恶感,但这也从深层反映出,作为一种精神信仰的基督教,于萧乾至多是一种精神寄托。这也意味着,当他找到新的精神寄托之后,基督教便很容易从其精神层面剥离开来。

总之,虽然萧乾反映在小说中的这些思想受到了他早年个人遭际以及所处时代民族危亡的影响,但较之同时代包括许地山等在内的其他一些受基督教影响的作家而言,萧乾对基督教的确有着较多的负面看法。

萧乾对基督教的复杂心态或许影响了他和包贵思之间的深入交往。他不像冰心,因为接受了基督教,而与包贵思有了一种精神上的天然相通;他也不像杨刚,因为坚定的革命立场,而与包贵思有着一种基于社会承担意识的彼此理解和尊重。他与杨刚在包贵思家里的读书会上相识,从此杨刚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他也没有因为杨刚的影响走向革命,他早年的自由主义倾向使他与革命保持着一种游离关系。

结　语

随着对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适应,最初以传教为主的教会大学,逐渐转变为以传授文化科学知识为主。在13所基督新教教会大学中,来华传教士包贵思所任教的燕京大学颇具代表性和影响力。除了学校提倡信仰自由、富有包容性的大环境之外,作为燕京大学英文系的教授,包贵思也以其博爱之心与个人魅力赢得来自不同信仰层面学生的尊重,她与燕京大学现代作家群的关系也值得探讨。在包贵思的学生中,既有像冰心这样的基督徒,也有像杨刚这样的共产党人,还有像萧乾这样的反教会者。作为冰心的恩师,包贵思既对冰心在信仰及学业方面有所帮助,也译介了冰心的《春水》等作品,为冰心作品的西传做出了独特贡献。包贵思与杨刚之间的师生友谊则反映了一个传教士与共产党人之间关于信仰与革命的真诚对话以及相互间的理解与尊重,并通过包贵思创作的长篇小说《河畔淳颐园》体现出来。包贵思与燕大旁听生萧乾之间的关系比较微妙,或许由于萧乾对基督教的复杂心态而影响了他和包贵思之间的深入交往。此外,包贵思也与许地山等燕大教师作家有密切来往。据冰心回忆,1929年1月许地山和周俟松的订婚就是在燕大朗润园包贵思家里,而且是由冰心向满客厅的同学和同事们宣布的(《追念许地山先生》)。总之,作为近代来华女传教士中的佼佼者,包贵思不仅以其精湛的英美文学的专业教学赢得师生们的尊重,而且以其谦和包容的心态与学生建立起超越信仰的师生关系。

[责任编辑:金　城　jdxbjc@163.com]

①萧乾:《<创作四试·象征篇>前言》,鲍霁编:《萧乾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334页。

②萧乾:《在十字架的阴影下》,《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1期。